

一起声震省城的事件

——记海宁博儒镇农民1946年的赴杭请愿斗争

孙禹坤

1946年2月19日起的几天时间里，位于杭嘉湖平原中心的海宁发生了一起全省震惊的事件——博儒镇全镇农民，为开河引起纠纷，不仅痛打了国民党政府镇公所的人员，捣毁镇公所，最后事态扩大，全乡农民还星夜沿铁路步行到省城杭州请愿。虽然最后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但对当时的反动政权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博儒镇位于沪杭铁路周王庙车站以北约两华里的地方。全镇仅几十户人家，有座纵跨洛塘河的古石桥名博儒桥，镇即以桥得名。原来河北东端还有一家“孙万茂”油车，四方农民在春秋两季，以自产的菜籽和黄豆到这里来换油，平时商业也还算繁荣。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海宁县政府鉴于县境各条塘河因战时失修，逐渐淤塞，严重影响了水路交通和附近乡镇的农田灌溉，当即组织全县农民进行一次全面疏浚。当时采用的办法是由附近各乡镇分段包干，也未说明有否报酬。宁郭塘河位于县境中部，从海宁旧时县城盐官镇北达郭店镇。参加宁郭塘河疏浚工程的有郭店、春富、博儒等乡镇的农民。博儒镇分派到郭店以南的一段河道。二月初，各乡镇派来的青壮年就纷纷前来报到并迅速动工。

由于参加开河的人员来自各个乡镇，负责浚河工程的人员也没将有关情况具体说清，更谈不上要解决开河农民的^{实际}困难，因此一开始就引起群众的不满。春富镇的农民就以土方分配不公责问监工人员，监工回答说是各乡镇土方是按壮丁人数^{分配}，当时双方就发生争执，甚

至动武。博儒镇一、二、三、四、五各保都有壮丁参加，这次浚河工程，他们听人说开河是“以工代赈”，有面粉发放，而直到19日下午，即开工第六天时，还不见有面粉发下来，认为一是被经办人员贪污去了，要向镇长算帐。四保农民公推孙一弘、孙雪荣到镇公所质问，大伙顿时自动收工回家（另据当时《海宁民报》报道，说是农民受人“造谣煽动”，“谓此项工程不属本镇，系镇长朱煦会同河道疏浚处的雇员孙凌标向当局承包办理，藉以中饱”而引起事端）。镇公所人员看到大批农民挤满街头，哄哄闹闹，发觉事情不妙，一个个拔腿溜走。孙一弘、孙雪荣等赶到河道疏浚处，众人把里面的东西打得落花流水，还抓住一个来不及躲避的监工人员痛打了一顿，随即又赶到镇西边靠街的镇公所，早已不见人影，赶来的一、二、三、四、五各保的农民群众顿时火冒三丈，冲进里边，当即将镇公所的门窗、办公桌椅等悉数捣毁（据当时报载，还放火烧了镇公所的案卷簿籍，带走了铃记——即镇公所的公章）。整个浚河工程至此全部停工，博儒镇街上的几家商店也全部停止营业。

事情发生后，农民们意识到事态已经扩大，立即商议下一步对策。有的要向县政府请愿；有的听说蒋介石当时正在杭州，认为不如干脆到省城杭州去。多数人赞成到杭州请愿，当下决定。全乡各保农民都去，每家至少要去一个人，由各保保长负责带领，一个保一个保的在夜里分别出发。如果那户不去，就要向他算帐。消息很快传遍各村，恰好当时正逢农历正月，大部分人家都备有过年的年糕，便随身带点年糕作为干粮，以保为单位，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沪杭铁路连夜西奔杭州（仅一小部分人坐火车），并赶在天亮之前，陆陆续续到达昱山门。大伙出发时，也把抓到的那个监工人员捆绑了带去。

。博儒镇公所挨打之后，镇长连夜上报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府闻知，知道事态严重，一方面命令县自卫大队长俞文奎等迅速赶到博儒，连同原在那里驻防的自卫队成员，在博儒桥南面青宗寺劝要赴杭州请愿的农民，表示有什么要求可推派代表和县里协商，但收效不大，仅仅拦回了一小部分人；另一方面，连夜派人坐火车去杭州，赶在步行的农民尚未到达省城杭州之前，向省里告急，在当地报纸《海宁民报》上，也登了《疏浚宁郭塘河，博儒莠民肇事》的消息。省政府获悉后，立即派了大批警察，在良山门附近阻止农民进镇。海宁县政府并在第二天再次增调了县自卫大队一、二两个中队的人员，由中队长杨建、曹贯有率领，由硖石进驻周王庙与博儒镇两处。

去杭州请愿的农民，因被阻未能进城，只得在城外一块草地上静坐等待。一天一夜过去，仍然不见动静，随身带来的年糕等已吃完了，各人身边带的钱又不多，多数人匆促间连钱也没有带出来，天气又冷，无法再停留下去，只得陆续返回。回来时，有的挂在货车上，有的坐火车，多数仍是靠自己的两条腿跑回来。

这时，海宁县长凌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程森士，城斜区区长俞祥林等也都亲自赶到博儒，并要农民派代表来协商调解。农民方面，请了附近芳田村里的一位名叫孙国仑的（原在上海当律师）拟写了一纸呈文，向县政府控告镇公所，最后的结果是：原镇长朱某调离博儒镇，区长俞祥林调离城斜，实际上是不了了之，除了那个被抓起来的监工人员白白挨了农民的一顿痛打之外，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

解放前海宁盐官地区的一次罢教斗争

顾明德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扣欠教育经费不发，海宁县盐官地区各校发动了一次历时约两周之久的联合罢教斗争。这件事当时不仅震动全县，也曾在沪杭等地报纸上作了报道，在各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学校的基本情况

盐官镇历来是本县的主要乡镇之一。当时的盐官镇中心国民学校设在北寺巷，有九个年级，15名教师，500多名学生。在所属辅导区里，有^县后街保校、全喜弄保校、必家湾保校、平安桥保校、徐步桥保校等五所初级小学，由盐官镇中心辅导。五所保校共有11个年级，13名教师，500多名学生，总起来，整个盐官镇共有6所学校，二十个年级，1000多名学生，28名教师，1个工友。

当时海宁县县长是凌华，教育科长是李文魁，各校校长由县政府委派，^{当时一部分公费由镇公所发}也可由校长自行聘请。那时盐官地区各校教师，大部分年轻有为，教育认真，所以各个学校办得还算令人满意。

罢教起因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初期，教育经费原来是由县政府发放的，但不久却推给地方，要各个乡镇“自筹”了。盐官地区各校，规定由盐官镇公所负责发放。可是，正当教师们信心十足，努力教学之时，开学已两个多月，教育经费却分文不发。秋风飒爽，天气骤凉，物价亦不断上涨，教师生活本极清苦，经济来源一旦长期断绝，实在不能挨冻受饥，坚持教学。虽然学校也曾派人几度去镇公所交涉，可是镇长俞祥林却态度傲慢骄横，干脆回答：“无米无钱可发”，经过多方面

的了解，最后得到消息，原来在上个月份，盐官镇长俞祥林将本应发给学校的教育经费，挪移作扩充他实力的保安队冬季服装费用，和修建盐官镇公所房屋的费用去了，因而两个月不发小教工资。教师们得悉之下，个个怒不可遏，气愤填膺，因此，当张有彩、周一~~坪~~^坪等教师首先提出罢教时，全体教师一致同意，并于第三天见诸行动，整个盐官地区六所小学、29名教工，1000余名学生同时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罢教罢课斗争。

罢教期间的活动和组织分工

为了不使影响学生的功课，并争取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在罢教之前，先对学生说明情况，要学生们在罢教期间，在家里好好复习功课，并帮助家里做些适当^{家务}劳动，不能乱闯乱^走，^要严格遵守纪律制度，和在校读书^时一样。同时组织部分高年级同学定期来校，跟随老师上街宣传。

这次罢教是自发的，但为了防止被扣上“红帽子”，也尽量避免引起家长和社会人士的不满意，所以我们全体教师几经研究，一再商讨，在事先制订了一整套计划，决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

一、对外交涉、联系工作，由顾明德负责。首先向镇公所催索工资，并公开向俞祥林宣布：如再不发工资，无衣无食的教师们，实难坚持教学，势必实行被迫罢教。同时，将俞祥林的强硬^{蛮横}、不屑一顾的态度，汇报给教师们听。另一方面，邀请各保校校长教师进行座谈讨论，首先晓以大义，陈述利害，讨论怎样和中心学校教师配合行动，听从统一指挥。为了防止反动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并且告诉他们，这次罢教，尽可大胆行动，一切后果完全由中心学校负责，大家自始至终要密切配合，绝对不能中途妥协投降。

二、组织师生宣传队。每天下午两时左右，由许瑞章、孙绍仲带领部分高年级学生，上街宣传罢教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要吃饭，要穿衣，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是为了要坚持教学，尽力教好学生，办好学校，并介绍小学教师当前生活处境的困难实况，以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同情和谅解。

三、教师参加海塘工程队劳动。由朱九如、王文超两教师去海塘工程队联系，要求参加以工代赈的劳动。当时盐官南门外“鬲”字号海塘正在进行紧急抢修，我们的行动得到了海塘工程队的支持。消息传来，就有朱慧英、徐云卿、朱九如、王文义、吴昌言、许中乃等以及保校的年轻教师十余人主动报名参加，在抢修海塘工地，我们除了堆塘泥、拾碎砖乱石之外，还扎了两天柴龙。由朱九如、王文超领队，每天上、下午参加劳动两小时。事后，还领得了两袋面粉回来，解决了暂时困难。

四、通过沪杭两地报纸，向各界广为宣传呼吁。当时由张有彩、周一坤、陈伯良等教师撰写报道，直接投寄上海《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杭州《东南日报》等报社，公布这次罢教的真相，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和行动。各报社不但刊登了我们的稿件，有的还刊登为我们在海塘上扎柴龙的照片。

在整个罢教期间，我们还不断了解和交流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大约在每天晚学后、晚饭前的这段时间里，各路人马就聚集在盐官中心学校的办公室里，总结一天的经验教训，汇报镇公所的动作、小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评论，以及研究制订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镇公所俞祥林的阴谋

罢教一开始，就使当时国民党当局完全处在被动、不利的地位。

镇长俞祥林原以为“罢教”只不过口头说说而已，却不料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势。当时的《海宁民报》虽然也曾假惺惺的用为学生“请命的口气报道：“盐官各校罢课，教费不发决不复课，千余学生顿告失学”，实际上是为反动政府说话。要我们教师忍受俞祥林之类的迫害。大家没有理会这一套。俞祥林开始想以空话骗人，一看劝说不成，又心生一计，策划另外组织一套人马，强行接管中心学校，最后由于组织不起这套接替人员的阵容而放弃。并在镇公所内部扬言，要张有彩、吴昌言、王文超、朱九如、陈伯良等好看。

这次罢教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开始，高潮在十一月中旬，一直坚持了两周之久。最后，迫使镇公所不得不接受教师们提出的条件。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在学潮结束时，俞祥林要我解聘教导主任张有彩，表示余均可继续聘任。为了避免张有彩遭到陷害，寒假后我将他介绍到奉贤县杜行中心任教。作者附注）

复课以后

当我们领到教育经费以后，全镇各校立即恢复教课。开始时，张有彩、吴昌言两位老师以欠薪分两次发放而在宿舍里睡觉，不肯复教，后经学生代表请求，才来教课。

这次全镇罢教，由于各校校教师组织严密，步调一致，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因此学生不出事故，治安不受影响，反动派的种种阴谋也不能得逞。

复课以后，全镇各校教师将罢课期间所缺课程，逐渐补足。所以镇公所无法非难我们，社会人士、学生家长不但不责难我们，相反却同情、尊敬我们。一九四六年第二学期开学时，家长们安安心心，学

生们欢欢喜喜，照样报名上学读书。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感情也更融洽了。

（编者按：作者为退休教师，当时任盐官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此文系她与张有彩、朱九如、徐云^作、吴昌言、许中乃、张仲厚^{散处}各地老师共同回忆，研究商讨后所撰写。）

《海宁民报》简史

刘季良

《海宁民报》原系国民党海宁县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30年，在当时的海宁县治即今盐官镇出版发行，为铅印4号字4开4版日报，内容除本县要闻外，以社会新闻为主。廖^季文、羊^仰高等^人任主笔，周浴文等人任该报编辑。“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冬本县沦陷前夕停刊。

这里我所叙述的，是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海宁民报》简况。

1939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4月间，刘季良、羊治^耘等十人从天目山“浙江省战区工作人员训练班”结训后回本县政工队。那时，本县的抗战局面，非常恶化，原来以袁花为政治核心，北至马桥 西南达丁桥一线的游击区已沦入敌手，游击武装力量省自卫第五支队已撤出县境。县政府机关暂驻于海盐县的石泉附近。县内各地敌骑^蹂躏，汉奸横行，群众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我们凭着人地^熟的条件，决定把县政工队先回驻县境（当时刘季良任工作干事，羊治^耘任总务干事）。

政工队回县后，我们为了要告诉群众：我们的抗日队伍，还没有被敌人消灭，即着手出一份不定期的八开一版油印小报，因当时时间

匆促，未多予考虑，就以抗战前的《海宁民报》为报名。那时候我们手头不要说收报机，就连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也没有，因此报纸内容也只能是本县的敌军暴行和伪方新闻等等，但时也从难得得到的后方的报刊上摘登一些前方胜利消息。

我们政工队干事室的人员，白天搜集资料，编写稿件，晚上集中一起，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刻腊纸、搞油印等工作，虽然每期印数仅四、五十份，但每次都要忙到深夜。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的报纸是不能公开发行的。每期报纸印好后，于次日由干事室人员把报纸秘密送至两个区队，再由队员晚上到丁桥、芦湾、丰镇等集镇，把报纸从商店的店板缝中塞进去，并在镇上再张贴几份。

大约经过个把月时间，终因经费问题，刚诞生的油印《海宁民报》便夭折了。

同年秋初，县长阮性之调离，由谢叔锐接任县长，县府推进县境，在丁桥丰镇一带乡间流动办公，并建立了一些武装，形势略有好转。县政工队人事也略有变动，屠琦任工作干事，刘季良任总务干事，干事驻于丰镇南郊两面街的一个周姓的酒作坊内，从此起，油印的《海宁民报》又复刊了。编印报纸的地点，设在一个附近的桃园里的一所空屋内。那时，队员孙秉璋从家里弄来了一架破旧的三管收音机，经自己修复后投入使用。屠琦编辑，刘季良负责刻印及协助写稿，孙秉璋负责收录广播消息。从此，我们的油印报上有了些前线消息。有时收不到后方广播，就选择一些沪杭等地的敌伪电台广播而加以反方向的改写后刊出。如有一次我们收到上海敌伪电台为查扣追回当天的伪《中华日报》的广播后，我们即次日设法借到一份《中华日报》，在仔细查阅下，终于发现上

海一则游艺场的广告里，往日刊登的“重金礼聘皇后”八个字，已换成了“打倒汪精卫卖国贼”八个字的一句爱国标语。我们即作了报道，对印刷工人巧妙的换植铅字，借汉奸报上骂汉奸的英勇爱国行为加以称颂，以激发群众对汉奸、走狗、卖国贼的仇恨心理。

此时的《海宁民报》已呈半公开状态，没过多久，就引起敌人的注目，接连数次袭击丰士，因此，我们的“报社”不得不流动起来，从丰士向东直至盐桥一带，作反复迁移，有时情况紧急，甚至一夜数迁。

我们在迁移时，最感到麻烦的，是收音机和纸张的携带。后来，收音仍由孙乘璋随身携带外，改为把纸张由东到西分三处存放，这样我们在移动时，便可到处出报了。

这里还值得提一提的，是孙乘璋爱护收音机的事。有一次，敌人袭扰丰镇，密集的枪声，很快向我们的工作地点——桃园逼近，我们不得不作紧急撤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孙乘璋深怕携带收音机易露目标而受损失，他抱着收音机毅然地说：“你们快撤，让我在园内草中躲一躲”。由于时不容缓，我们只好匆匆地离开了他。幸亏敌人没有发现桃园，因而孙乘璋和收音机得能安全无恙。

自从县情报室人员投敌后，1940年春县长谢叔锐又被捕投敌，游击区局势再次恶化，县府机关势呈瓦解，《海宁民报》又一次宣告停刊。

是年1940年秋，程森士来县重整游击区的党政局面，于是，油印的《海宁民报》又复刊了。当时，报纸在丁桥附近流动出版，工作人员有郭志宏、刘季良、朱大雪（女）等三人。十月间，报纸迁县党部所在地肖家埭出版。在此期间，情况比较安定，报纸工作人员也作了分工，郭志宏任编辑，刘季良刻写腊纸，朱大雪油印，汪坚负责

采访工作。后因郭志宏等人另派工作，刘季良也离县到后方，油印的《海宁民报》遂于1941年1月间再次停刊。

1944年4月，在县府秘书屠琦的主持下，油印《海宁民报》又复刊了。后改石印版。编辑费维勤，程叶（女）写石印原纸，仍为八开三日版。后改日报。电信稿由县府电台提供。在陆家桥、麻郎桥、林家亭一带流动出版。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石印版《海宁民报》随县府推进硤石，继续出版。同年10月，派李嘉伦筹办印刷设备，改出铅印版。自此时起，《海宁民报》的组织渐趋正规，编制规模也相应扩大，社长屠琦，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总编辑吴竞亚（1948年下半年由葛覃暂代），编辑周浴文，杨树生（杨主编经济新闻）记者张涤先、葛覃，校对有谈志根、张颖等。1946年6月起由刘季良任经理兼编辑，1947年任秘书兼编辑（主编副刊），李嘉伦任营业部主任兼管排印车间（1948年起由李国庆主任），朱锦耀为会计。

报纸版面情况：《海宁民报》为四开四版日报，起初用老五号字排印，1946年下半年起改用新五号字。第一版为电讯版，版面下面是广告，那时报社没有收发报机设备，也无“中央社”电信稿，因此，只靠杨树生收点广播消息。第二版为本县新闻带广告，内容仍以社会新闻为主，稿源除本报记者采访外，由各乡镇通讯员供稿。1948年起，为争取海盐县的发行量，还拍出一版面刊登《海盐新闻》，并派张涤甫为驻海盐记者。每晚以电话向报社发稿。第三版为《经济新闻》，主要报道“每日行情”（即商情物价）在当时物价一日数涨、经济极度不稳的局势下，这个“经济新闻”版很受广大商界欢迎。第四版为副刊，刊名《海潮》，栏首每天有一篇花框短文，名曰《潮流》笔名“小炮手”，专门抨击时弊，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例如1948

年中一篇题为《谷不如麦》，抨击当时海宁显赫人物合作社县联社主任沈永香以麦代谷收取蚕种款。（当时因物价不稳，蚕种收款是以稻谷计，经巧妙折算，可以看出剥削蚕农，从中渔利的恶劣勾当。沈永香见报后气咻，地来社长屠琦，但文章既已刊出，屠琦也无可奈何。

副刊版曾出版《青年》、《妇女》、《医药卫生》等定期专刊，由陆克昌及县卫生院编稿，可惜未能持久。1946年秋，就没有继续出刊了。

副刊版除文艺、杂文小品外，每周还辟《大众谈》专栏，和《问题解答》栏等。

自1947年起，副刊版每周出刊《海潮画刊》，除漫画、图片外，还刊出苏、美、英等国的驻沪使馆新闻处的图片（这些图片，他们已制成照相制版寄来后，即可排印），刊出的有联合国介绍（每期介绍一国），和英女皇加冕礼等照片。在刊出的漫画中，记得有一组特约漫画很有意思，画面的说明是：明七暗八九签到，十点钟来看看报，十一点钟泡泡茶，十二点钟下了班。对当时腐败的政府机关办公室，讽刺得淋漓尽致。

《海潮》副刊还在1947年农历3月18观潮节，出刊以铜版纸彩色套印的《观潮专刊》，随报附送及另售。内容是盐官胜景及潮景，图文并茂。很受读者欢迎。

《海宁民报》系县长凌华题写，1947年6月间，曾改用孙中山先生手迹“民报”二字，报名下印“海宁”二个小字。但仅改数天，因凌华提出意见，仍用原来的四个字。

《海宁民报》的发行办法，除外埠的订、赠户由报社直接邮寄外，硖石和县内各乡镇均委托北石路范福康派报处代理发行。

《海宁民报》自改用新五号字后，各版版面的编排及印刷质量有

所改进，但终因发行数量不多（仅千份左右），经济窘困。有一段时间的印刷用纸，甚至每天向纸店另购。报社对纸张问题颇有“难为无米之炊”之忧。1947年下半年，报社曾将印刷设备向浙江省地方银行抵押贷款，用作周转。

1948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张嘉璈之胞妹张约仪（徐志摩前妻）来硤时，报社向其求援，曾由国家拨下两吨低价报纸，借以维持出版。以后，终因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在国民党反动政权行将复灭前，于1948年12月与国民党县党部的机关报《海宁导报》合并，改出《联合报》。由县党部秘书魏味艰主持，直至解放前夕停刊。